

史料引用致误原因分析

何忠礼, 周方高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自古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错误的或者事实模糊不清的史料很多, 如果不作必要的考证鉴别, 很难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造成史料引用致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归结起来主要有: (1) 史料本身无误, 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而致误; (2) 史料本身无误, 由于引用者推断不确而致误; (3) 史料内容比较含蓄, 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致误; (4) 没有直接引用原书而致误; (5) 因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 (6) 史料本身就有错误。

[关键词] 史料; 引用; 致误;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5) 05 - 0052 - 07

众所周知,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离开了它研究就会寸步难行。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以傅斯年先生为代表的史学研究者甚至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 他们认为, 史家的责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傅先生指出: “只要把材料整理好, 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十分材料出十分货, 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p.56) 此话看似有些忽视理论的偏向, 但是从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这一点来说是没有错的。

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固不待言, 但是自古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错误的或者事实模糊不清的史料实在太多, 所以有了足够的史料以后, 还须作必要的考证鉴别, 做到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否则史料再多也不能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那么, 造成史料引用致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在此根据自己做学问的体会, 略谈几点看法。

一、史料本身无误, 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而致误

虽然造成此类错误并非史料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引用者受水平所限或者另有目的所致, 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一样的, 即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误引史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由于研究者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正确句读而造成的错误; 一种是研究者有意曲解原意而造成的错误。

没有正确理解史料原意而出现误引的情况, 可以举出以下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其一《苏东坡集》卷三〇《答秦太虚书》一首云: “初到黄(州), 廩入既绝, 人口不少, 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 日用不过百五十钱, 每月朔, 便取四千五百钱, 断为三十块, 挂屋梁上, 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 即藏去叉, 仍以大竹筒别贮, 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此贾耘老法也。”有学者据此以为, 苏轼全家在黄州时一天的生活费只需 150 钱; “每月四千五百文尚能维持一家的最低生活”, 从而得出宋神宗元丰年

[收稿日期] 2005 - 06 - 1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何忠礼(1938 -) 男, 浙江绍兴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宋史、科举制度史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方面的研究; 2. 周方高(1973 -) 男, 湖南双峰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间(1078—1085)黄州物价相当便宜的结论。实际上,此处的“日用”钱,乃是苏轼个人一天的零用钱,并非全家一天的生活费。试想,哪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是吃一天买一天的呢?由于引用者对这条史料的原意理解有误,所以对当时黄州物价水平高低的估价就产生了偏差^[2]。

其二,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卷上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即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道)之先矣。”陆深据隋文帝敕文认为,雕版印刷在隋朝已经产生,比五代时宰相冯道奏请雕版的《国子监九经》要早三百余年。此论一出,包括叶德辉、毛春翔、吴则虞诸先生在内的一些近代学者皆信以为然,并以此作为隋朝已经有了雕版印刷的证据。然而,这里的“雕撰”并非雕版,而是雕刻和撰写之意。原来,当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曾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大批僧尼被还俗,大量佛像被捣毁或熔化,许多佛经遭到毁灭。隋朝建立后,十分佞佛的文帝,曾多次下诏命各地恢复早年被破坏的寺庙,重造佛像和经卷,而佛像需要雕刻,佛经需要撰写,这就是“雕撰”的真正含义。由于陆深对诏令中“雕撰”两字理解不确,将它作为隋朝已有雕版印刷的史料,遂造成失误。

另有一种是引用者故意曲解史料原意,为自己的论点制造根据。最明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四人帮”御用学者为政治斗争的需要,一面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竭力宣扬“是奴隶们创造了历史”,一面却竭力吹捧秦始皇,竟说“焚书坑儒”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行动”。再如,在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因为毛泽东说过“海瑞就是彭德怀”这样一句话,于是他们就大批海瑞,凡是属于海瑞为民请愿的史实,都称其为“狡猾手段”和“欺骗人民的软刀子”,进而作出清官比贪官还坏的结论。实际上,他们是否真是这样认识,非常值得怀疑。

古人写的文章虽然没有标点,但读的时候绝不是一口气读到底,而是根据文义,在句与句之间稍作停顿,此谓句读。古人很重视句读,常常让年轻学子用朱笔对有关文章作句读,以检查和训练他们对文章的理解能力。古人说:“学识何如观点书。”^[3]清人顾炎武说:“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谓千载笑端矣。”^[4]足见句读对学习和理解古籍的重要性。可是句读的难度很大,无论古人或今人,在句读上出问题的颇多,这样就容易造成对史料理解的错误。南宋刘昌诗在《芦浦笔记》卷一列举了古人句读错误的两个例子。一是“冯妇”条,时人句读为:“《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其为士者笑之。”刘昌诗以为,此处之“则之野”不通,当作如下句读:“《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其为士者笑之。”二是《约法三章》条,班固《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人们都据此以为这里的“约”,乃“省约”之“约”,即废除秦朝苛法,省约以为三章。此后“约法三章”还成了一条成语。然而考《史记·高帝纪上》载,汉高祖元年(206)十月,刘邦入关后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高帝纪上》所记同。刘昌诗以为刘邦所言之约,并非省约之“约”,乃是约定之“约”,即与诸侯约定,先入关者王关中;后与父老约定,废除秦的苛法,只立三章。班固在《刑法志》中将“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八字连成一句读,并进一步简化成“约法三章”,显然使原意遭到了歪曲。

古人有句读之误,今人则有标点之误,由于对一些名物制度不甚了解而乱点一通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之《司马光奏议》卷三八《乞以十科举士札子》中,有这样一段经过标点的文字:“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竟将以上所有官职全部包括在“职事官”这一名目之下,把宋代官、职、差遣三者搞得混乱不堪。正确的标点应是:“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条云:“……特奏名三举,皆值异恩,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此处之“虽助教亦出官归

正”一句,颇令人费解。按宋代有“归正人”一词,系指流落邻国(南宋时多指金朝),后来脱身回到宋朝之人,或原系契丹、金朝之官民,投奔宋朝之人。助教出官,怎么能称“归正”呢?后句“人每州以数十百”,依语气当指助教而言,而这与事实也大不合,南宋每州何来数十百助教?原来这两句当作如下标点:“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

从上述数例可以看出,如果史料断句有误,引用时也会发生错误。

二、史料本身无误,引用者推断不确而致误

对于内容具有普遍性的史料,一般来说可以举一反三加以引用,而对于内容具有特殊性的史料,就只能用于特定场合,如果推断不确,也会造成失误。如在我国夏商西周的选举中,虽然普遍实行世卿世禄制,可是偶尔也有“选贤与能”的情况出现,如商汤以伊尹为相,武丁以傅说为相,周文王以吕尚为师等,但如果有人通过上述史料,以为在三代的选举制度中,大量地实行了“选贤与能”的做法,就有违史实。再如清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曾谕内阁曰:“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悖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雍正这段上谕说得如此严厉和明白无误,史料的正确性当然无可怀疑。但是,如果有人从清统治者遵守祖训的前提出发,以这条史料为依据,推断出从乾隆朝起,史书中再也没有删节或改写类似胡、虏、夷、狄等字的现象,那可谓是大错特错了。只要我们打开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四库全书》,就会发现这种删改俯拾皆是。

此外,如有人将史籍所载丰收地区的粮价,推断为当时全国性的粮价;将个别水利条件好、土质肥沃地区的粮食产量,推断为各地的普遍产量;将只有宰执大臣才能享受到的优厚俸禄,推断为全国所有官吏的俸禄都很高;将少数农家子弟通过科举侥幸跻身仕途的例子,推断为在科举制度下,取士已无贫富之分;将某一历史人物偶尔说了一句同情穷人的话,就说他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此等等,他们所引用的史料似乎并没错,但由于推断不确,一样会造成失误。

三、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致误

有些史家慑于某种压力,或因为某种忌讳和需要,对一些史事的记载比较隐晦含蓄,往往以故弄玄虚的文字和荒诞不经的内容加以掩饰。对此,在引用时若缺乏深入辨析,或置之不理,或信以为真,往往会造成失误。如《史记·高祖纪上》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邦生时,距司马迁撰《史记》之时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没有像夏商周三代那样远,所以对于刘邦的身世,即使部分采自传说,也不可能与事实相差太远,既然不会有龙与人交之事,那么这条史料必然有其特定的含义(秦汉以降,帝王以这种方式诞生,史书记载没有第二例)。可是,对于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实录”,千百年来只被人们视作神化开国皇帝刘邦的一个手法,而忽略了刘邦并非太公所生的事实。近人王云度先生经过周密考证后指出:“刘邦原本并非太公之子(淮南王)刘长原本并非刘邦之子。这些都是一点即破之事。然而两千年来一直未能点破,可能与人们长期来善于习惯性思维,缺乏创造性思维有关。所以说只要我们不囿于成见,善于变换角度看待史料、思考问题,则在被前人翻烂了的《史记》、《汉书》中一定还能不断有所发现。”^{[5][p.164]}所谓“习惯性思维”,也就是先入为主和以史料论史料的思维方式,由于缺乏对一些颇具疑窦的史料作出必要的辨析和考证,在研究中就容易造成偏差。

再如宋高宗赵构生母韦氏,自靖康之变被金人俘掳北去,直到“绍兴和议”签订后的次年才返回南

宋 她在金朝生活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其间,金方一再传出消息,说她已经下嫁金朝贵族。对于这样一条基本上可以相信的史料,南宋士大夫以为此皆“粘罕编造秘书,诬蔑韦后”所致。理由是:“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6] (pp. 214-215) 宋人从臣子之心出发,竭力加以讳饰辩解,当然不难理解,但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宁可相信南宋人的解释,而不愿相信金人的话,就使人感到不可理喻。因为既然兀术可以一再率军南下,穷追猛打,以俘掳赵构、灭亡南宋为最终目的,那么,残暴好色的女真奴隶主贵族对于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俘虏,何必因其“年老”(38岁)而轻易将她放过,仅仅用“编造秘书”加以侮辱而已^[7]? 这种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南宋立场上看问题的“习惯性思维”,也妨碍了对史料的判断和选择,从而造成失误。

四、没有直接引用原书而致误

有些人在撰写论著时,因为手头一时找不到记载某条史料的原书,或是贪图省时省力,有时会将他人论著中所引用的史料一抄了之,这种情况在某些年轻学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要知道,任何一种论著中所引用的史料,由于撰者转录时的粗心或排版时的失误,加上校对疏忽等原因,都可能产生误引、脱漏、篡改、倒乙之类的错误,如果将这些有错误的引文直接照抄,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毋庸赘举。还有一些汇编、汇抄之类的史籍,如《宋朝事实类苑》、《宋稗类钞》、《宋人轶事汇编》、《清稗类钞》等书,因其所载史事比较集中,研究者往往喜欢加以引用,但是这类史书在编撰时已对原书内容作了删节或改编,文字上并不完全相同,如果将它当作原文加以转引,也会造成失误。另外,还有一些史籍中所引内容,撰者已有意识地进行了节略,但往往仍以原文的面貌出现,后来的整理者甚至还将它们加上引号,乍一看似乎就是原文,如点校本《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书就有这种情况。对此,引用时都要特别加以注意。

五、因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

一部史籍往往有多种版本,其中就有优劣、全缺之分。某些抄本或刊本,由于抄刻疏忽,或为了牟利而粗制滥造,或以残本充全本,常使内容产生脱漏或舛误。如南北朝时有一权贵读了一篇载有《蜀都赋》的抄本,里面有“蹲鸱”两字,注曰:“芋也”,但将“芋”字误写成“羊”字。一次,有人送羊肉一方馈赠这位权贵,他在复信中用了“损惠蹲鸱”一语以示感谢,同时也显示自己学识之渊博。可是明明送去的是羊肉,怎么变成了芋头呢?收信人读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吕氏春秋·察传》有这样一条记载:“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古代有一句成语,叫“鲁鱼亥豕”,就是指这类错误。根据笔者经验,在古籍中,类似“二与三”、“三与五”、“十与千”这些因字形相似而造成“鲁鱼亥豕”式的错误实在不少。

版本不善还表现在卷帙的残缺上。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对宋江最后是否投降朝廷的问题有过一场激烈争论,邓广铭先生力主宋江没有投降,有些学者则认为宋江确实投降了。后来,有一位学者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发表了题为《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文章引用北宋末年官员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中的一段诗文。该诗文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豕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以此证明宋江接受了北宋政府的招安。至此,邓先生才承认宋江确实投降了,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论者或问:邓先生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对宋人文集几乎已经读遍,岂会连《忠愍集》里的这首诗也没有见过?原来《忠愍集》有《四库》本、《乾坤正气集》本、《畿辅丛书》本和《正谊堂全书》本四种,只有《四库》本为三卷本,其余皆为一卷本,诗词就收录在《四库》本的第二卷里,邓

先生因为恰恰没有读过《四库》本,所以才不知道有这首《捕盗偶成》诗。

六、史料本身就有错误

这是史料引用致误的最主要原因。造成史料本身错误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意错乱史实,即作者屈服于统治者的权势,或为了个人名利,或为了个人恩怨,或出于宗派利益,故意湮没、歪曲、美化、丑化乃至捏造史实。另一种是无意识地错乱史实,即作者依据错误的记载和传闻,或记忆、抄写偶误所致。

有意识被错乱的史实,在史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如北齐魏收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不惜远攀高附。他在《魏书·自序》中说:“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建……(子建)二子收、祚。”正如南宋人洪迈对此批判道:“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8]南朝齐梁间的萧子显撰《南齐书》,对其父疑亦竭尽美化之能事,在不过三十万言的《南齐书》中《萧疑传》就达九千余字,赞语中说他是“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肉麻吹捧可谓无以复加。再如明朝建文帝即位后,为防止诸藩王尾大不掉,用齐泰、黄子澄策,实行削藩措施。于是燕王朱棣“举兵反”,经过四年战争,取代建文帝自立为帝。在明朝的国史和实录中,都将这场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争夺统治权的战争,称之为“靖难之役”,叛乱成了“靖难”,这就是中国史书上常常演绎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生动例子。更有甚者,有些修史者出于党派倾轧或个人恩怨,甚至不惜伪造历史。如北宋末年,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假借苏洵之名,伪撰《辨奸论》一篇,文中说苏洵生前已预知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官员的王安石乃不近人情的“大奸慝”,“鲜不为天下患”。邵伯温为使他人相信《辨奸论》确实出于苏洵之手,同时又假托张方平之名,伪撰《文安先生(苏洵)墓表》,表中有《辨奸论》的内容,假托苏轼之名,伪撰《谢张太保(方平)撰先人墓表书》各一篇,以资佐证,作伪手段之高明,可谓天衣无缝。于是南宋人都相信《辨奸论》为苏洵所撰,甚至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的李焘对此也深信不疑,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加以收录。但经过清人李绂、蔡上翔,特别是经过邓广铭先生的详细考证,证明《辨奸论》确系托名伪撰^[9]。

至于无意识被错乱的史实,其原因也有很多,有些是所据材料不够正确,有些是受本人学识和时间所限,有些是在记载和引用中或多或少地掺进了撰者的个人感情,更多的则是抄写时粗心大意而导致笔误。故南宋末年的周密有“著书之难”之叹。他认为即使如司马光、朱熹这样的大家,著书中的错误亦不能免。周密以《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两书为例指出:“《通鉴》若汉景帝四年内,日食皆误书于秋夏之交,甚至重复书杨彪赐之子于一年之间。至朱文公修《纲目》,亦承其误而不自觉,而《纲目》之误尤甚。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后,至天祐之季,甲子并差。盖纪载编摩,条目浩博,势所必至,无足怪者。”^[10]关于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霞客)有否到过西藏一事,梁启超与其友人丁文江有过一场辩论,梁据《徐弘祖墓志铭》,认为他到过西藏;丁坚持认为没有到过,并请梁看《徐霞客游记》。至此梁才发觉自己错了并自我解嘲地说:“然为彼墓铭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更可笑也。”^[11]这种记载的失误,不仅对前代和他人,就是记本朝人和本朝事,甚至记父祖和本人的履历,有时也会发生错误。如唐德宗朝名将李晟到底生有儿子,各种碑传的记载颇不一致,收入《金石萃编》卷一〇八《李晟碑》记作12人,其子《李昕碑》记作兄弟16人,新旧《唐书·李晟传》则记作15人,甚至还有10人之说。上述碑传的原始材料来自于李晟子孙所提供的行状、墓志和家传,应该说都有很大的权威性。造成这种人数错乱的主要原因,并非因为李晟妻妾太多,嫡出者有意贱视庶出者的缘故,而是李晟子女甚多,其中可能有一些早殇者,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统计失误所致。

因粗心大意而造成史料舛误者更是不胜枚举。有些是修史者本人所造成的舛误,有些是传抄、翻

刻者所造成的讹误。以前者论，各种史书，即使是著名史家所撰之书，皆难免有误书、误增、脱落等情况出现；以后者论，造成的讹误就更多。以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为例，其中宋金元史所刊，人称其“脱简遗文，指不胜数”^①；阙文之外，更有复页^②。其他诸史，类似情况也很多。

造成史事记载失实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常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如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的婚期，有在场目击者说是 1915 年 10 月 25 日，可是查阅历史档案，包括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孙、宋结婚《誓约书》原件，均为 10 月 26 日。一为人证，一为物证，两者皆可称得上是铁证，孰是孰非，实难考证。后来有人只好写信给宋庆龄，才弄清应为 10 月 25 日。原因是日本的风俗以双日为吉祥，孙、宋接受律师和田瑞的建议，在《誓约书》中将 25 日改成 26 日^{[12] p. 609}。要不是当时宋庆龄尚健在，此事将永远成为无头公案。这虽然只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也足以说明史实错乱原因之纷繁、复杂。

[参 考 文 献]

[1]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A].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第 2 册[C].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54 - 245.
[2] 何忠礼. 围绕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4)：126 - 134.
[3] 李匡衍. 资暇集 卷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
[4] 顾炎武. 日知录 卷三一[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5] 王云度. 刘邦血亲析疑[J]. 中国史研究，1997 (4)：162 - 164.
[6] 确庵. 耐庵. 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语[M]. 北京：中华书局笺注本，1988.
[7] 何忠礼. 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A]. 文史 第 39 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94. 135 - 147.
[8] 洪迈. 容斋三笔·魏收作史 卷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
[9] 邓广铭. 《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A]. 邓广铭. 治史丛稿[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16 - 346.
[10] 周密. 齐东野语·著书之难 卷一九[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
[1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12] 朱蘧生. 敝帚集[M].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责任编辑 何海峰]

Major Causes for Misquotation & Mis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E Zhong-li , ZHOU Fang-g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s :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But many of them have since ancient times been incorrect or obscur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refore , it is not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out making any necessary differentiation or criticism regarding these materials. Major causes for misquoting and misusing them in academic research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

(1) Misuse of correct materials because of the user 's misunderstanding/misinterpretation/ mispunctuation , or of political purposes. (2) Misuse of correct materials because of the user 's faulty reasoning based on the

① 详见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 年版第 3 页，张济元序。

wrong information or context. (3) Misquotation of materials with hidden meaning as the quoter failed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4) Misquotation from indirect or misquoted/mistaken historical information. (5) Misquotation from the bad or unreliable edition or text as many ancient historical books each may have more than one edition. (6) Use of wro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had been manipulated for political, factional or private purposes, or due to the writer's own mistakes.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s; quotation; misquotation/misuse; causes

乌克兰与俄罗斯教育发展纲要比较

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俄罗斯在沿用原有教育体制的同时,分别开始制订本国教育长期发展纲要。对乌、俄教育发展纲要阶段性成果的详细分析表明,两种方案存在着本质区别。

1. 俄罗斯把教育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而在乌克兰,教育被视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强调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俄罗斯联邦政府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国家现代化应当立足于教育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更新其内容和机制。”乌克兰开始时基本继承了前苏联的教育体制,包括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研究生教育),但在今天,前苏联单一的普通教育学校模式已被打破,学校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俄政府尝试将教育发展纲要置于一个完整的坐标体系中,通过全面了解时代要求来确定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重要理论。并且,俄罗斯教育理论的形成促进了军事、外交、信息安全等一系列其他学说的合理完善。而乌克兰民族教育发展纲要“是关于教育的惟一官方文献,延续至今的前苏联循规蹈矩式的思维造成教育发展纲要的片面性和孤立性,从而没能从战略角度看待教育改革,并视发展教育为国家经济振兴的前提条件。

2. 乌克兰和俄罗斯教育发展纲要的酝酿、讨论和通过程序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在民族教育发展纲要的准备工作中,俄罗斯专门成立了有代表性的部门间协调委员会,最大限度地吸纳政府及各独立科研机构的专家和学者,让各界人士参与这一重要的理论性文献的起草工作。乌克兰在酝酿民族教育发展纲要过程中,仅仅吸收了一小部分专家的意见,没有形成基础理论性文件,从而影响了乌克兰教育发展纲要的内容和结构。

俄罗斯联邦前教育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沙德利柯夫称,104个联邦机构和部门对教育发展纲要的草案内容表示支持。论证与提案委员会共总结出一百五十多页意见,其中工会的三十多页重要建议被纳入纲要草案。讨论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工作者能明确发展纲要对他们有什么具体指导意义吗?发展纲要针对的对象是谁?是什么?发展纲要有哪种法律效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给出更多有关完善发展纲要的提案。讨论过程常常涉及修改立法以保障纲要得以实施的问题。此外,还就发展纲要实施机制及其物质保障进行了研讨,特别是教育部门的财政制度等问题。

乌克兰在公众媒体上刊载、介绍了民族教育发展纲要的官方条文之后不久便开始了公开讨论,但规模、深度与广度远远不够。与俄罗斯教育发展纲要目标的具体性和实际性相对应,乌克兰教育发展纲要实施结果的含糊和笼统甚至使非教育行业的公众也感到诧异。专家们认为,今后在乌克兰的确要形成广泛的关于民族教育发展纲要的讨论,并通过具体的实施机制来补充和丰富最真诚、最人道的教育宣言。

上述对比表明,乌克兰教育发展纲要还局限在个别领域,远没有形成真正完善的国家发展纲要学说。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从工业发展阶段向信息社会过渡时期,教育发展学说的产生是符合这一阶段要求的。由于缺乏良好的经济基础,乌克兰的教育改革似乎带有一种构想的色彩。此外,由于改革缺乏过渡过程,习惯传统教育方式的教师对改革的适应较慢。受暂时经济困难的制约,乌克兰教育改革步伐不可能迈得很快,但全国上下改革的愿望非常强烈,新的民族教育发展纲要的诞生就是很好的证明。

作为教育大国的俄罗斯,历经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厚实的教育发展基础。前苏联解体后,政治失序和经济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教育陷入困境,但原有的深厚的社会人文基础和良好的体系基础,会为其教育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要求,俄罗斯教育改革将侧重于发展从结构到内容和从人文到技术的“完整型”普通教育,相互衔接、多层次、开放性的高等教育以及体系与内容并重和学校与社会沟通的职业教育。

(沈杰)